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35

刘禹锡

张家鹏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学术顾问

季羨林

钟敬文

启功

程千帆

丛书策划

侯忠义

杨爱群

特邀编审
(按姓氏笔画)

宋加哲

张俊

张国星

林辰

侯忠义

欧阳健

高翔

董文成

傅憎享

薛勤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35

刘禹锡

张家鹏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刘禹锡/张家鹏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1

(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

ISBN 7-5313-1990-X

I. 刘… II. 张… III. ①唐诗—文学评论—中国②刘禹锡 (772~843)—文学评论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4737 号

刘 禹 锡

张家鹏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辽宁建平兴海打印中心制版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58 千字 印张: 3½ 插页: 2

印数: 1—8,000 册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杨爱群

王维良

王 颖

责任校对: 唐惠凡

封面设计: 杜凤宝

版式设计: 马寄萍

ISBN 7-5313-1990-X/I·1728

本册定价: 6.00 元 总定价 (全 100 册): 600.00 元

目 录

- 一、刘禹锡的时代/1
- 二、刘禹锡的生活经历/14
 - (一)人生的起步/16
 - (二)科举入仕/19
 - (三)从幕僚到监察御史/22
 - (四)参与永贞革新/25
 - (五)贬官朗州/28
 - (六)再贬后三任刺史/33
 - (七)再回京师/43
 - (八)外放上州刺史/47
 - (九)退居洛阳/53
- 三、刘禹锡的诗歌/60
 - (一)诗歌内容/60
 - (二)诗歌艺术特色/79
- 四、刘禹锡的散文/93
- 五、刘禹锡的影响/101

一、刘禹锡的时代

刘禹锡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进步的思想家，一位富有才情的士子。他擅长散文，雅爱书法和音乐，对医学、天文亦有研究，尤以诗歌卓然成家，宛如诗国天幕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光耀千秋。他的创作不仅为唐音增添了异彩，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学遗产。别林斯基曾说“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刘禹锡当然不会例外。任何诗人的成长都要经受社会风雨的洗礼和传统文化的滋养，诗人自身展现的社会历史范式与文化范式，总是被一定的社会经济和具体的社会特点所制约，每个时代的歌手无疑是个体特性与社会普遍性的合金。因此，我们要正确地认识诗人，评价其文学创作的成就，必须从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入手。

刘禹锡生活在唐中叶后，一生经历了代、德、顺、宪、穆、敬、文、武宗八朝。他来到世上，几经沧桑的唐帝国已度过了它的一百五十三个春秋，而使帝国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刚刚过去了十六年。他离开人间六十五年后，李唐王朝的国祚便

刘禹锡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贞元九年进士，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十年，贬朗州司马。十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十四年，贬连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十六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十七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十八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十九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二十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二十一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二十二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二十三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二十四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二十五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二十六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二十七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二十八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二十九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三十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三十一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三十二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三十三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三十四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三十五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三十六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三十七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三十八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三十九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四十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四十一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四十二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四十三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四十四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四十五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四十六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四十七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四十八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四十九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五十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五十一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五十二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五十三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五十四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五十五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五十六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五十七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五十八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五十九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六十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六十一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六十二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六十三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六十四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六十五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六十六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六十七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六十八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六十九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七十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七十一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七十二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七十三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七十四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七十五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七十六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七十七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七十八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七十九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八十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八十一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八十二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八十三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八十四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八十五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八十六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八十七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八十八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八十九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九十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九十一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九十二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九十三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九十四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九十五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九十六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九十七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九十八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九十九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元和第一百年，召还，授太子校书郎。



刘禹锡像

选自《苏州沧浪亭五百名贤像》(北京图书馆藏)

不复存在了。这段历史正是封建社会多种矛盾日趋尖锐、交错并发的苦难岁月，也是仁人志士直面现实，多方探索，渴望帝国中兴的年代。

跋扈的藩镇称雄割据是刘禹锡时代无计根除的社会痼疾。藩镇的原义本来是形容地方军政机构屏藩王室，镇守一方的美称。唐代天宝初年，缘边曾置十个节镇辖区，其长官只有一个称为经略使，余者皆称节度使，总揽区内军、民、财政，经营边事。内地则设有十五道，其长官称为采访使，负责举劾所属州县官吏，后来改称观察使，兼理民政。在中央政权相对稳定时期，还未发生武夫悍将的公然挑战，不仅节度使、采访使的辖区广大，而且常用重臣兼任几镇节帅，委以方面重托。安史乱中及其平定之后，中央集权大为削弱，出现了特殊的政治、军事形势。在各种矛盾互相制约下，中原内地亦屯重兵，对掌兵的刺史多加节度使称号，于是形成了“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新唐书》卷五十《兵志》），所谓藩镇林立的格局。唐中后期的藩镇大约稳定在四五十个，藩帅握有一支独立的地方部队，执掌军政合一的大权，强藩重镇拥兵坐大，雄据地方，俨然如独立王国。以魏博、成德、卢龙三镇为代表的河朔地区，算是这类的典型。因其节度使大都出于安史降将，唐廷又对他们采取姑息迁就的态度，使之有恃无恐，表面上“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通鉴》卷二二五）。甚

至藩帅都由本镇拥立,赋税由将士瓜分。他们“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旧唐书·李怀仙传》),动辄互相勾结,反叛中央,或彼此攻打,战争不断。从代宗到德宗,藩镇之祸愈演愈烈。在刘禹锡十岁那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子李惟岳,趁父死去擅自袭职,自称留后,并与魏博、淄青、山南东道节度使串通一气,联合反唐。起始朝廷派卢龙节度使朱滔等人率军讨伐,旋即平叛者与作乱者狼狈为奸。翌年,叛镇以朱滔为盟主,纷纷称王。进而他们勾结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反唐势力从河北扩大到河南。德宗建中四年(783),李希烈陷汝州,进围襄城,朝廷急调泾原节度使姚令言讨伐。军经长安,因政府不给犒赏,发生兵变,德宗逃往奉天(陕西乾县),朱泚据长安称帝。第二年唐军在李晟率领下收复长安,朱泚败走、被杀。贞元二年(786)李希烈为部将陈仙奇所杀,至此两河地区的战乱暂息。当时十五岁的刘禹锡尽管在江南吴地习文攻诗,想必大混战的消息不会没有耳闻。宪宗朝继续对藩镇进行斗争,趁剿灭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有利时机,更换了三十六个藩镇首领,全国获得了暂时的统一。然而唐王朝并没有消除藩镇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割据基础,短时间的统一过后,唐廷再失河朔,各地藩镇时起作乱。据统计,自代宗广德元年(763)到僖宗乾符元年(874)的百余年里,共发生藩镇动乱一百七十一起。由于唐廷没有一支控摄全国的武装,中央讨叛,主要依靠

政府控制下的藩镇,利用藩镇间的相互牵制,维持王朝统治。接连不断的征伐平乱,使国家元气大伤,战区经济惨遭破坏,生灵涂炭,千里萧条,社会财源产生危机,军费开支日趋膨胀。史载元和时期中央财赋收入,“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通鉴》卷二三七)。这种局面把社会推向了恶性循环的轨道,即使没有殃及兵燹的农民,也逃脱不了土地兼并的魔掌和徭役、兵役、租税的重重盘剥。被逼破产的农民为了谋生,有的应募参军,当了雇佣兵,成为藩帅进行割据的工具。出于笼络军心的需要,藩帅常常对将士施以恩贿,日久天长,藩镇兵士嗜利成性,骄横凶蛮,就是这些没有归耕条件的骄兵,将投身行伍当作活命的饭碗。一旦出现藩帅的行动意愿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便会立即做出反应,轻则拒绝调遣,重则置节度使于死地,包括藩帅表示归服朝廷这样堂皇正大的事情也不能例外。总之,唐廷只要依赖藩镇势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来维持它的虚弱政权,就无法根治藩镇尾大不掉带来的一连串的灾祸。

宦官专权与朋党争斗是刘禹锡时代政治腐朽的产物,酷似植根在王朝机体上的两个无法剥离的毒瘤。宦官是古代贵族和君王蓄养的近侍随从。汉代以前,帝王们开始逐渐选用阉割过的人

做宫内的家奴,自东汉起就全用施以宫刑的阉人负责侍奉皇帝和“三宫六院”的生活起居。因而,宦官被铸造成不男不女的特殊形象,到了明朝又把宦官称作太监。《西游记》中猪八戒将太监误认作老太婆,还矢口咬定是别人“反了阴阳”,看来并不是闭着眼睛说瞎话。然而,这身为奴隶的“刑余之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高度集权的朝代,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政治舞台上左右时局、动荡社会的很大力量,如秦、汉、唐、宋、明等莫不如此。可是,唐代宦官专权独具特色,不但其权柄重、势焰凶、时间长、影响大为古史所罕见。而且握有军权,或统领神策军,或出任地方监军,在中晚唐的军事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宦官势力颇为猖獗的东汉与明王朝亦未曾有过的。究其原因,问题又回到了藩镇身上。玄宗始置节度使于边塞,远离京都,控制重兵,专制的君王对此自然放心不下。认为自己眼皮底下的家奴,身分低贱,依靠他们难以构成严重威胁,因之首开了宦官到节镇监军的先例。肃宗在讨伐安史叛乱的严峻时刻,在朔方军的保护下慌乱中于灵武登基,新政权的产生底气不足,十分软弱,必然要采取制约以朔方军为首的各地作战部队的新举措。扶植宦官势力就是一项重要内容,于是由宦官专掌的神策军便应运而生。神策军最初是陇右节度使管辖下的临洮之西的军镇名称,这里的部队在参加讨伐安史叛军和与吐蕃作战时,归高级监军大宦官鱼朝

恩指挥,及本军旧将领调走后,鱼朝恩就成了这支神策军的统帅。当代宗避难陕州,鱼“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代宗返京,“朝恩遂以军归禁军,自将之”(《新唐书·兵志》)。从此神策军成为一支新的禁军,其职权除拱卫京师外,还驻防京西北的大片地方,可以说是直属皇帝的野战部队。德宗贞元十二年(796),以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自此出任中尉的宦官成了名正言顺的神策军长官。敬宗时又正式设立了两员由宦官充任的枢密使,掌管机密,宣传诏旨,乃至和宰相“共参国政”。中尉独掌兵权,枢密使分掌政权,气势咄咄逼人,时有“内大臣”之称。诚然,由皇帝扶植起来的宦官势力在阻遏新兴军阀搞山头、闹地震的斗争中有过功绩。但是宦官与士大夫相比,其素质总差了一大截,他们得势坑国害民,贪赃枉法,破坏社会安定比士大夫更凶狂露骨。代宗时宦官李辅国竟提出让皇帝只“坐禁中,外事听老奴处分”。宦官鱼朝恩作势,得意夸口说“天下事有不由我乎”。德宗自贞元以后,“〔宦官〕威权日炽,兰锜将臣,率皆子蓄,藩方戎帅,必以贿成”,“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旧唐书·宦官传序》)。非但卖官鬻爵,公求贿赂下及商贾,有的商贩挂名神策军籍,身不宿卫,以钱代行,接受给赐,仍在市场上从事贩鬻。他们依仗宦官权势,广置资产,很少输税,并免除各种差役。德宗还用宦官为宫市使,掠夺市上货物。

对宦官专横暴恣的种种行径，各级官吏只能徒唤奈何，就是皇帝自身也受到要挟。刘禹锡参与的永贞革新失败后，宦官擅权变本加厉。文宗大和九年（853）的“甘露之变”，宦官仇士良指挥神策军大杀宰相朝臣，“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旧唐书·李训传》）。帝王的鹰犬反倒掌握了主子的废立权柄，从穆宗到昭宗相继七帝皆是宦官所立，而宪、敬二帝竟被宦官杀害。列宁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全集》卷二十四四五九页）专制君主在各种势力面前搞平衡，不惜违背王朝的吏治法规，让宦官干政，破坏封建政治正常的结构和秩序，最终引发官僚与宦官的对立，直接动摇了皇权。丢掉法制求稳定，结果得到的是永不休止的动乱。

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里，朋党争斗是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矛盾的又一表现形式。身陷争斗旋涡的李德裕是这样勾勒它的脸谱的：今天的朋党，在位当权者就诬善害能，欺上瞒下；下野丢官的则四处串联钻营，惟务权势，朝夜密谋于私室，以致“清美之官，尽须其党，华要之选，不在他人”（《会昌一品集》卷十）。朋党为祸严重地腐蚀了统治集团，瓦解了中央集权，邦国黎民深受其害。流毒所致，宦官权幸、聚货富豪、机要朝臣、贾人污吏，形成了一个牢固的关系网，受贿复行贿，上引及下攀，互相利用，沆瀣一气。谋高官、渔厚利、拉大

帮、结死党，使财归其室，权操其手，酿就了“国用日蹙，生人日困”的深重灾难(李德裕《食货论》)。概言之，这些都是封建社会朋党争斗的共性问题。而刘禹锡在仕途中遇到的所谓“牛李(德裕)党争”，是与藩镇、宦官势力有着掰不开、扯不断的牵连，伴随着更多的曲折与是非，笼罩着更多的迷雾和阴谋。剥掉其表面的假现象，才能窥见历史党争的真相。事情的缘起是元和年间朝臣对如何处理藩镇叛离的政见之争。其时身居相位的李吉甫在削藩的事业上建树颇著，对于讨平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与镇海节度使李锜的谋反，他出谋划策，非常得力。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请袭父位。李认为淮西不同河朔，处内地而无党援，国家有重兵守御，应该因时而取之，帮助宪宗下定了讨贼的决心。吉甫死于元和九年(814)，次年裴度拜相，继续致力削藩。在用兵淮西的重大国事上，另位宰相李逢吉妒贤伤善，暗中阻挠而被罢相，从此深恨裴度并追怨吉甫。李逢吉不顾大局，不恤国事，首结朋党，历宪、穆、敬三朝，排陷裴度不遗余力。穆宗长庆二年(822)三月，裴自太原入朝拜相，逢吉密结宦官，引为内援，挑拨裴度与元稹的矛盾，令裴、元两人落职，逢吉代度为相。李逢吉排斥裴度的同时，又拉牛僧孺入相，把很有声望的吉甫之子李德裕挤出朝廷。“逢吉以恩惠结交朝臣奸佞之徒”，勾结宦官贬逐名士，朝臣张又新等八人“代逢吉鸣吠”，“时号‘八关十六子’”

(《旧唐书·李逢吉传》)。敬宗末年逢吉诬陷裴度的丑迹大白于天下,旋被罢黜,其子李宗闵和牛僧孺接过逢吉衣钵遂成党魁。文宗器重德裕,“召为兵部侍郎,裴度荐以为相”,而宗闵有宦官支持当了宰相,又汲引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结,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旧唐书·李德裕》),此际牛李(宗闵)权势显赫于朝野。可见逢吉结党在先,肇始裴度入相,僧孺、宗闵入伙于后,直至宣宗初年德裕死,这就是“牛李党争”的基本面貌。朋党倾轧是封建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中晚唐时期这样尖锐激烈是不多见的。刘禹锡后半生和“牛李两党”的官僚有过广泛的交往,他却幸免了非牛即李的归属,然而唐王朝倒是无法避免党争惹来的祸患。

兴利除弊、革新图强是刘禹锡时代一种十分活跃的社会思潮。大家知道,唐王朝是在安史叛乱的浩劫中步履艰难地迈入了它的中期的。昔日的强盛帝国,陡然间从开、天时代的高峰上跌落下来,人们在惊惧惶恐之余,睁眼环顾,一切都变了模样。遭受干戈蹂躏的中原,满眼是“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旧唐书·刘晏传》)。而没遭兵燹的江南,承担着交纳国赋的重荷,已被搜刮殆空,“吴越征徭非旧日,秣陵凋敝不宜秋”(《全唐诗》第二一六四页)。遍体鳞伤的王朝又遭到新的打击,吐蕃入寇,直逼京畿,强蕃叛服不定,内乱不息。肃宗、代宗平庸昏聩,亲信宦官,依重奸佞,招致政出多门,朝纲混乱。在这历史的转

折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有识之士和怀有参政报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关心国运、蒿目时艰,针对现实的诸种弊端,力图革新自强。当时李泌对改革朝政就提出了不少意见。著名的理财家刘晏,被任为度支、铸钱、盐铁及转运、常平等使以来,改进税法,调剂物价,兴盐利,运漕米,活跃市场,利国利民,同时培养了像刘禹锡父亲刘绪及其舅氏卢征那样一批善掌财赋的官员。德宗即位伊始,施行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善政,如以刘晏总领天下财赋,加郭子仪尚父号,罢诸道岁贡若干种,令止不合时宜的奢侈用度等。对外与吐蕃修好,通使聘问,“西戎畏威,底贡内附”(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第六十二页),边燧火息。特别是在均田制被破坏,租庸调无法征收和庄田经济大规模发展的形势下,朝廷采用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在建中元年(780)实行了“两税法”。这是按土地、资产多少为标准的征税制度。其征收对象和办法,简要地说,即按现居地点立户籍,不分主客户,包括行居不定的商贾,依贫富程度定等级,不分丁男中男,纳税分夏秋两次完成。它适应了彼时的经济结构,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增加国家收入,也能为赋税主要承担者广大农民所接受,这颇有力度的税制变革,至宋元各朝仍在沿用。然而刚露面的一点中兴气象,跟着刘晏被害、奸邪窃权、两河藩镇迭叛等诱发的时弊,转瞬间成了过眼云烟。陆贽指出:大历中非法赋敛者,“既并入两税矣,今于两税之外,非

法之事复又并存,此则人益困穷”(《陆宣公翰苑集》卷二十二),从皇帝到县官,长吏大贪,小吏也沾,官场上下都在钻政治腐败的空子捞便宜。顺宗时王叔文等人的革新集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不料,宪宗急于接班当皇帝,很快把王叔文等人打下去,但他没有闭眼无视现实,鼎新的步子迈出一些,局面有了好转,国力相对恢复。总的看来,革新势力还是相当薄弱的,在朝廷中没有占主导地位,改革举措常因干扰而流产。不过,革新思潮的历史作用和影响却不可低估。与政治经济改革活动相联系,思想文化领域也有积极的反映。振兴儒学,把它当作改造现实的武器,便是突出的表现。贞元年间太常博士施士丐则以经学注疏的方式表达了变革思想,韩愈、刘禹锡等青年士子受益非浅。韩愈进一步创立儒家道统来抵制佛老泛滥,又同柳宗元掀起“古文运动”,用古文载儒道,蔚为壮观。白居易等人弘扬儒家诗教精神,注重诗歌的社会教育功效,发动了“新乐府运动”,声势很大。二者双峰并峙,为整个文坛带来新貌,遗风余响,代有回声,亦为革新思潮注入了活力。

综上所述,可知刘禹锡是生活在一个很有特色的时代。唐王朝经历了百多年的风雨岁月,在自身运作的历史进程中所积淀下来的消极因素,终于恶性发作,导致了社会动荡,挣扎在窘境中。但是曾经强盛的帝国,凭借长期建设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基础,凭借着雄厚的人才资源,不断

地整治和调养疮痍遍布的机体。刘禹锡作为转折时期的一介书生，他满怀功业思想和报国之志，踏上仕途不久，即投身到社会变革的激流中。而变幻不定的政治力量把他无情地推进了不幸的渊海。他渴望李唐重振国威，寻求弭除社会赘疣和帝国中兴的出路。他的许多文章是在坎坷中与社会、百姓接触后的思考，有着很高的现实性和认识价值。